

一批带有传奇色彩的手稿——谈章太炎的三批手稿

陈汉玉

近世奇人章太炎，集革命斗士、学者、文豪、书法家于一身，声名倾东南，文字满天下，但由于他一生多在奔走革命，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身家性命置之不顾，所以尽管专著、文章一版再版，手稿却难有集中、完整的保存。然而，国家图书馆（原北京图书馆）却意外藏有章氏前期手稿 100 余件，来历不明，内容亦奇。

这些手稿分三批入藏。

第一批约百件，入藏时作一大包，编在一个登录号下，三十年前整理时重新编号，分袋收藏。

该批中约 90 件是单篇散页，一般写在无格的八开薄宣纸上，铺天盖地，



密密麻麻，写完为止，字多者每页可到 2500 以上，一般文字清楚，改动极少。其余是线装书册：有一册题为《太炎集》，目录依干支排序，许多篇目与散篇相同，惜只存第 1 册；有 2 册是包背装草稿本，收文 50 余篇，多数篇目与散篇同，篇间不留空行，文字歪斜潦草，极不规整，涂改很多。不难看出，这 3 个书册是散篇的底本或草稿本，散篇为誊稿或清稿。散篇很多曾收入 1914 年《雅言》及 1915 年《章氏丛书》，应是 1913—16 年章氏幽禁北京期间选编《章氏丛书》时的经手作品。同名的手稿杭州馆亦有，但时间应该比较靠后。

章氏名作《癸书》的修改稿亦在其中。《癸书》为章氏首部专著，1899 年编定，由梁启超题写书名，木刻印行；1902 年重订，由邹容题写书名，1904 年在日本铅印出版；1914 年秋冬，章氏在北京再次修订，改名《检论》。国家馆所藏即为再次修订本，以 1906 年 9 月日本铅印本为底本增删勾勒，增补处满是蝇头小字。曾有专家研究过该稿，认为“从增改内容来看，有写于辛亥革命之前，也有写于辛亥革命之后，可能是一改再改。”该件可能是《癸书》现存最早手稿，“一改再改”的痕迹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

陈汉玉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。

最奇的是三件样式一致的线装收藏册。册高 33.5 厘米，宽 22 厘米，蓝绢封面，白宣册页，用料考究，工艺精致，应为专业匠人制成。

一册收有文件 4 份：一为内城官医院院长徐延祚要求将章氏迁移居处、以利康复的呈文，文后有 6 月 15 日京师巡警总监吴炳湘的批复；一为章氏致国务卿及各总长，要求“缴上勋章，归受梵戒”的呈文；一为章氏致顺天时报记者，透露仍未解除监禁的新闻稿件；一为章氏索要被扣生活费的索欠函和帐目清单。第一、二件应写于 1914 年，第三件应写于 1916 年，第四件应写于 1915 年初。

一册收信函数件：章氏致商务印书馆函，致月霞法师函，致朱希祖函；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致朱希祖函等。

另一册收章氏各种墨迹 20 余件，纸张质地各异，尺寸各异，字体有楷、隶、小篆、行草，内容有文稿、诗颂、铭诰，包括为讽吴炳湘而作的《巡警总监箴》。

第二批三件，为《新方言》、《六诗说》和《驳皮锡瑞三书》。每件登录一号。三件均为线装书册，深色纸书衣，比较正规，稿纸各异，应为不同时期写成。《新方言》为章氏代表作，同名手稿杭州馆亦有收藏，但国家馆明显为初稿。查章氏 1906 年出狱后由孙中山接往日本，担任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的主笔兼发行人，直至 1908 年《民报》被迫停刊为止，《新方言》是章氏笔战之余的研究所得。国家馆藏《新方言》使用《民报》稿纸写成，比后来用普通稿纸修定或誊录的《新方言》价值要高。

第三批一件五页，由章氏致黎元洪的两封函稿组成，贴在用“直隶省警察统计表”页订成的小册子里。统计表用最廉价的机制纸印成，册子用最普通的家用白线订成，极其简陋。第一封应写于 1916 年袁世凯刚死，要求撤警及谒见；第二封议论明年国会大选事，写作时间有待考证。后者有大块墨污，应是废弃的草稿。

三批手稿几乎都与章氏幽禁北京有关，奇怪的是，袁世凯死后，章氏南归时，它们为什么没有随同南下？它们曾流落到何人手里？又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进入图书馆？

查章氏年谱，1913 年 8 月，章氏冒险入京，即被幽禁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。章氏愤怒，醉则怒骂，“骂倦则作书自遣，大篆、小楷、行草，堆置案头，日若干纸，党中侪辈欲得其书者，则令购宣纸易之”。

1914 年元旦刚过，章氏欲走天津不成，“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”，被骗至外城龙泉寺幽禁。1914 年 5 月底，章氏决意绝食，以死抗争，曾写家书称“亡后尚有书籍遗稿皆在京师”，原注“又自定文稿皆在篋中”。6 月，警方怕其饿死，由官医院院长特务徐延祚出面，建议迁地疗养，经警察总监吴炳湘批准后，移居东城本司胡

同徐氏家中。不久，又在东城钱粮胡同赁屋居住。直至袁世凯自毙。徐延祚事见于若干文献，但其呈文及吴炳湘批文未见有载。

章氏幽禁北京期间，寓中门房仆役均由特务充当，章氏不但没有行动自由，书信也多被扣压。袁政府每月拨钱 500 元为生活费，由于章氏一向不问钱财，曾被徐医生及特务暗中克扣。章氏生性倔强，知道后索要，十足章氏风格。以往文献提及章氏弟子曾去交涉，未见章氏亲函索要的记载。

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死，章氏又作若干努力，才于 16 日获得自由。第三批第一函及第一批第一收藏册的致顺天时报新闻稿，即是其努力措施。章氏羁留北京三年，早思南归，又看到北京局面险恶，希望尽快脱离，撤警九天后的 25 日，便由天津取水路南归了。可以推测，国家馆所藏章氏文稿，极可能是章氏走时匆忙，未及携带的。

关于三批手稿的入馆时间，只能从登录号上寻找线索。根据前后书籍入馆情况，第一批手稿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入藏，第二、三批似在建国前夕的 1947 或 1948 年入藏。

第三批手稿的踪迹容易推断，由于是废弃底稿，又贴在简陋纸册上，收藏者应是充当仆役的下等特务。该收藏者看重的是名人手迹。可能由于后来物价腾贵，生活困苦，不得已出让，换了口粮。

第一批手稿的收藏者应是高级特务，必须具备某种权势，才能拥有巡警总监的批文，查扣致国务卿的信件，并能获得如此大量的章氏手稿。该收藏者看重的是公文和墨迹，文稿倒在其次。其出让原因还须探讨。

第二批手稿的收藏者可能是特务，也可能是章氏弟子。笔者认为，特务的可能性更大些。出让原因应该也是生活所迫。